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周蜀蓉著

发现边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13329-5



9 787101 133295 >

定价：118.00 元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周蜀蓉 著

发现边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周蜀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11

ISBN 978-7-101-13329-5

I.发… II.周… III.边疆地区-地方史-研究机构-中国
IV.K928.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0913号

书 名 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著 者 周蜀蓉

责任编辑 李闻辛

装帧设计 周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24½ 插页3 字数420千字

印 数 1-1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329-5

定 价 118.00元

作者简介

周蜀蓉，1955 年生于四川成都，文学学士，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四川大学宗教所基督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兼职教授。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先后从事中国古代女性、四川古代移民、华西基督教及近代华西边疆研究。研究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重庆市移民局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各类课题。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学研究珍稀基础资料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研究与重刊”。在《史学月刊》《四川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等十余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走向开放的人口》（合著）、《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合编）、《巴蜀移民史》（合著）、《边疆服务》、《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影印本》（合编）等图书，《巴蜀移民史》获四川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序

本书为四川大学博物馆周蜀蓉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的最终成果。周蜀蓉研究员是一位视野开阔、眼光高远、思维敏锐，且耐得寂寞、潜心学术的真诚学者。本书虽然是她2010年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形成的最终成果，但实际是她十多年着力研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所办《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一部力作，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专著。周蜀蓉研究员嘱我为之作序，我颇感为难。因我未曾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史事进行过梳理，仅在研究抗战时期基督教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时对之稍有了解，本不宜为这部十年磨一剑的大作作序，但阅读本书内容后，深为周蜀蓉研究员书中的许多精深见解所吸引，也为周蜀蓉研究员上下求索、锲而不舍的为学精神所感动，由是冒昧为序，意在将这部倾注了周蜀蓉研究员十多年心血的著述推介给广大读者。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始创于1922年3月，发起者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几位外国学者。创办伊始，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这是一项永垂史册的创举，今人回望历史才明确认识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性国际学术机构，且为民国时期华西边疆研究领域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国际学术机构之一。华西边疆研究兴盛之时有英、美、加、法、德、中、日、澳等国学者加入，会员一度达五百四十余人。学会立足于成都，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直接推动了近代西南民族、人类、地理、动植物、博物等学科的发展，更直接促成了中国民族学“华西学派”的形成。

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务终止，并被错误定性为“反动的西方学术机关”，研究就此成为国内学界不能涉猎的“禁区”，尘封半个世纪无人问津。迄今

为止，学术界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了解还极为有限，关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活动、研究等史事都未得到系统梳理，也没有看到一本关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专著问世。研究成果与学界的关注度都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所以长期未得全面研究，一方面因受当初政治定性的影响，一方面也因研究的不易而使不少学人望而却步。学会早年成员大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外国学者，来源较为分散，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均不易获取，学术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研究这个题目，面临的首要难点是资料的缺佚。周蜀蓉研究员之所以能写成本书，除她具有坚定的学术志向之外，也得益于近水楼台之便。她所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附属的图书、博物两馆一脉相承，现馆中收皮了较为完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档案和学会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得天独厚的条件给予她接触、并长期系统研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档案和学会杂志的良机。她前期即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作过相当精深的研究，还耗时耗力整理出版了完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索引。正因如此，作者可以透过珍贵的档案研究，为学界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叙，令人可一定程度重回历史现场，了解整个学会创立、发展、衰落的来龙去脉。

对于未知对象的研究，重建史实是必须迈出的首要一步，但历史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在这本专著中，作者不仅较为系统、全面、清晰地勾勒了学会创办、研究活动、演变过程、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影响，而且有意识地将学会放在全球文化殖民与20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大历史背景以及近现代中国学术生长、发展的宏大文化演进时空来考察学会的价值和意义。换言之，作者的研究事实上带着一系列很重要的思考。譬如以外国学者为核心甚至带有“文化殖民”色彩的华西边疆研究为何兴起，对帝国边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学会与近现代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的关系如何？作者通过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从外国学者为主体到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转变研究，围绕近代政学关系、“帝国想象”与“国族意识”的论述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虽为一家之言，却无疑地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足以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镜。

尤其能显示作者功力的，是该部专著通过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对西南边疆研究的现代转型进行了学术史的清理。因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与四川大学的历史渊源，从今日四川大学诸多学科的研究（或者放大了些说，整个西南边疆研

究)现状中都可或多或少地看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痕迹。除了民族学耳熟能详的“中国学派”由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直接促成,其他诸如考古、博物馆、动植物学等学科的兴起、转型也都多受其影响,甚至学术风格、学术理念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作为西南边地的四川与京华中心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心地区在西潮激荡之下,科学理念与方法迅为学人普遍效法,新成就大规模应运而生;作为西南边地的四川,学术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一样,皆徐徐而来。史学渐行由经入史,民族学等学科亦经历了由传统模型向科学方法的缓慢转变过程。厘清这一差异对全面认知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进程具有极其重大意义。周蜀蓉研究员本书的问世,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示了四川学术文化现代转型的面貌,呈明了这一转型的特殊机运及行进特点与轨迹。可说是研究非中心地区学术文化转型的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成就。

任何学术著述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学术研究。周蜀蓉研究员本书自然也不例外。譬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涉及的研究范围极广,但本书仅就引人注目的民族学、考古学等相关研究作了介绍,对于一些相对较偏冷的研究则涉及较少,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生与存在的意义和影响也还可进一步阐述与揭示。当然,一本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学术本来也不可穷尽,如果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形成几部著作就达到完美,历史研究就失去了永恒的魅力。周蜀蓉研究员写成这部专著是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研究不会终止,其他学人也会加入研究行列,完全可以期待将来有更多相关研究成果的持续涌现。

是为序。

陈廷湘

于四川大学

2016年9月

绪 论

与“国家”政治的近代转轨类似，中国西南边疆的学术研究也存在着近代转型的过程。自秦汉始，中国西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位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种传统一直沿继到清末，并引发边疆史地研究热潮。然自清末以降，西学东渐之风大盛，传统学风以及学术范式亦渐受西学影响与支配。与此同时，以外国学者为主导、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其间的近代西南边疆研究日趋成型。较之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近代西南边疆研究在研究范式、研究特点上无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两种不同学术范式的研究的本质区别即在于后者采用了近代学科分类的方式，利用近代学术方法对西南边疆进行研究。

在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转型过程中，成立于1922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简称学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①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简称杂志）更成为近代西南边疆研究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国际性刊物，堪称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研究的标杆。时至今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中仍被视为经典之作。

^① 华西（West China）一词，是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西部的总称，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边疆”一词，学者贾湖亭认为包括四种含义，即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本文所用“华西边疆”一词，采用西人及贾湖亭给出的含义。其时国人虽亦用此说，但更多使用“西南边疆”一词指代该区域，时有小于或等于该范围的表述。

一、学术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淡出中国学术舞台，结束了它在中国学术史上近三十年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降，学会的汉学背景被国内学界视为研究“禁区”，无学者论及，欧美学者亦因缺乏第一手材料少有涉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复苏”，90年代才有学者一般性提及，但研究仍因文献档案的缺失无法深入。截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对该学会少有介绍，更无专题研究。20世纪40年代，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942）和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47），在他们的著述中偶有提及。此后五十年几乎无人论及，直到90年代华西医科大学在编写《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90）时，才有所留意。进入21世纪，有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开始关注与提及，如周蜀蓉《研究西部开发的珍贵文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2003），张泽洪《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以国外学者为中心》（2004），李绍明、周蜀蓉《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2004），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2005），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2007），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2007），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2008）等。以上著述都是一般性提及，没有专门就学会本身做基础研究。到2010年以后有专论发表，如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再诠释》《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华西地区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思想演变初探（1922—1950）——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中心的考察》《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三星堆文化的早期研究》等。罗安国（Andres Rodriguez）《民国时期的民族构建和人类学：四川西部的传教人类学事业》，从传教人类学的视角对学会进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李如东《华西的植物研究：1920—1937——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以学会会员在华西展开的博物学活动与研究为考察对象，探析华西人类学研究的博物学基础。迄今为止尚无就学会本身做基础研究的专著问世，这表明国内外学界对它的研究尚不充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西研究领域曾风云一时，因历史原因被错误定性，这造成了学术传统中断，亦影响到中国西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旅美学者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自序中，有一段

寻找传教士葛维汉(D.C.Graham)的经历。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葛维汉是一位非凡的学者,曾撰写数十篇与四川宗教、风俗、考古、民族有关的人类学论文。王笛感叹:“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四川的学者,对他竟然一无所知。同时也为这样一位对四川宗教文化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美国人及著作被默默无闻地埋没而深感遗憾!”人类学家李绍明评论,王笛曾在四川大学就读又专攻近代史,但对葛在四川生活了三十八年,长期担任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简称华大)教授与博物馆馆长,有大量著作问世的情况,竟然不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文化断层,学术传承无继的严重性^①。葛维汉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期的学术带头人,学术无继,埋没的不止葛维汉,学会一大批优秀的中外学者都被埋没了。探讨学术传承,当代学者责无旁贷,给前辈一个交代,给后人提供一个哲学思维空间。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本书研究的对象。课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学会创建背景、发展历史、组织机构、学术活动、研究范围、研究特点及学术影响的研究,展示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尤其西学本土化的进程及演变脉络,这是目前学界提出华西学派等重要问题的依据。在复原学会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学会在华西基督教宣教史、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中国近代学术史、国际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而理解学会的历史作用。笔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民族)、语言文字学及自然科学等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研究。本书的篇章结构是,第一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建的背景;第二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建与发展;第三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组织结构;第四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附属机构;第五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术活动;第六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研究;第七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特点;第八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边疆研究。“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有点不同,简而言之,前者主要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后者则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②本书归于前者,它将对后者深邃的哲学思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填补了近代边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学术空白,有利于学术的繁荣,但学会及会刊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笔者是从90年代末开始从事学会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四川大学博

^① 李绍明:《略论中国人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3期,第45页。

^②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1页。

博物馆的前身，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四川大学博物馆承袭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全部文物标本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葛维汉图书室（David Crockett Graham Library）文献资料。四川大学博物馆出于对这批馆藏民国时期珍稀的西部研究文献资料的全面抢救保护的考虑，出于为国内外学界提供更翔实的学术参考的考虑，启动了整理这批资料遗产的工作，笔者有幸承担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教务杂志》（*The China Recorder*）、《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文献的整理工作。1999年以降，笔者在《四川图书馆学报》《中华文化论坛》《宗教学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四川文物》《南方民族考古》《博物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与华西边疆研究相关的数篇论文^①。2004年出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索引》，2014年出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影印本》^②。

2007年，四川大学博物馆发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三千多份原始档案及数据，这为研究学会提供了丰富参考。2010年，笔者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为题，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10BZS047）正式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年4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项目结项，本书稿正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项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文提及的西文刊物及民国刊印的边疆杂志、学会数千份档案、学会会员著述及传记、华大及其他基督教大学校史及刊印的文献。

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华西边疆研究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关注、认识和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一段时间里西方的政要、贵族、军人、商人及传教士蜂拥而至西南边疆考察、游历。所以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兴起于此时，西方学者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西方学者群体主要以学者、军官、传教士为主。民国边

① 论文题目参见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

② 前者附录于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后者是笔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学研究珍稀基础资料〈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研究与重刊》（13JJD850004）的前期成果。

疆史学家徐益棠回顾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时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①。当代学者评论中国人类学时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在西南展开的接近人类学的研究，多数是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所为，中国人最多就是帮他们提行李，做做翻译，整理材料^②。李绍明论西南民族时亦说，“在国人应用现代科学体系研究西南民族以前，西南民族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开拓的。近代，一些外国人先后进入西南地区，除了有的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或传教外，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③。

传教士对华西边疆的研究由来已久。自传教士进入华西以来，即不可避免地要对这片他们置身其间的世界观察、了解。无论是早期传教士对华西边疆人口、自然、环境、文化只言片语的描述，还是他们游历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观察、理解都可视为早期传教士了解、理解、研究华西边疆的源头。不过，早期的这类研究大多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有很强的随意性，也无固定的研究方法，因而谈不上有系统、有组织的研究。如果说源起于19世纪晚期的近代西南边疆研究，还多体现出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者各自为政的个人英雄主义特色，那么20世纪以来，机构化、团队化则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特别是20年代以华西传教士为核心组建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系近代首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在西南边疆研究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22年3月24日成立于中国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首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机构。学会旨在研究华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甘肃等地）的政治、人文、风俗习惯及其自然环境，尤其是这四个因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鼓励、支持并发表华西地区的社会与自然研究成果，特别是以西南地区为其考察研究的重点领域。学会会务终止于1950年，历经近三十年，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研究影响最大、历时最长的学术机构。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最初是一个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术小团体，最初学会成员仅十一人。学会章程明确规定会员不得超过二十五人，必须居住在华西，因此

① 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50页。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第51页。

③ 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53页。

早期会员大多是在川的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学会负责人是美籍体质人类学家、解剖学家莫尔思 (W.R.Morse)，主要成员有理学院教授戴谦和 (D.S.Dye)、医学人类学专家胡祖遗 (E.C.Wilford)、文学院教授布礼士 (A.J.Brace) 等，荣誉会员是西方著名地理学家叶长青 (J.H.Edgar)^①。随着研究的拓展与学会的发展，30年代后，学会逐渐跨出封闭的传教圈，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学术团体。特别是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寇侵略，大量高校、研究机构内迁云贵川西南三省。研究人员的大量涌入，以及西南边疆在国家复兴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使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抗战时期呈现空前繁荣。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生物学、医学、农学等学科人才的加入，为学会的繁荣注入了新生力量，使学会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日益提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一份材料中提及：

在这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学会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者，所以学会得到很大荣誉和利益。我们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学会拥有齐鲁大学的侯宝璋 (Hou Pao-chang) 教授、张奎 (Chang Kuei) 教授，南京大学的李小缘 (Li Siao-yuan) 教授、徐益棠 (Hsu Yu-tang) 教授和芳威廉 (William P. Fenn) 博士，金陵大学的刘恩兰 (Liu En-lan) 博士，燕京大学的林耀华 (Lin Yueh-hwa) 博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李方桂 (Li Fang-kueh) 博士和吴金鼎 (Wu Gin-ding) 博士。他们不仅积极推进了华西研究，而且对学会有极大的兴趣与关心。^②

大批高水平学人的加入使得学会的人员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学会从原来以西人为主，逐步向中、西学人共同研究的方向转变。自30年代后半期以降，中国会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等学者甚而还担任了学会会长，中国学者日益成为学会组织机构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随着文化机构的内迁，大批外籍学者也在30年代中后期加入学会，一些海外学者也被发展成为学会通信会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真正成为一所立足本地、面向世界的国际性学术机构。

作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

① 周蜀蓉：《研究西部开发的珍贵文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② “Secretary Writing”，*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16, B, (1946)：222.（为引用方便，以后用“JWCBS”代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医学、农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做了最早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其中,尤其以莫尔思、葛维汉和李安宅为代表,这三人分别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担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集中展现了西南地区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莫尔思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发起人,首任会长,亦是一位医学家,他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体质人类学方面。早在1924年,莫尔思就在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藏东部落成员人类学数据记录》一文,这是最早的华西体质人类学研究代表作。1935年至1936年间,莫尔思又主持了三次华西体质人类学考察,收集了汉、苗、藏和羌族血型,撰成《四川人的血型研究》论文。1937年,莫尔思发表了《体质人类学观测一览表》,介绍了对1919年至1926年四川十个民族中的三千零五十一名健康人的七十个人体专案的检测资料,这是典型的医学人类学(其时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1938年,这一成果在《英国人类学杂志》发表,引起世界人类学界的关注。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葛维汉(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是上世纪30年代华西边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葛氏1911年入川,在四川宜宾浸礼会工作,一边从事教会活动,一边进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曾十五次在四川各地考察,在四川生活并从事学术研究长达三十八年。1932年,葛氏出任华大古物博物馆馆长并兼任文化人类学教授,并在1934年主持了四川汉州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直至1948年,葛氏才离职退休返美。葛氏对苗、羌、藏的民族及宗教研究,以及西南地区考古学、博物学的发展影响巨大^①。1941年李安宅来到华大任教,历任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边疆研究所常务所长,40年代中后期,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人文版1945年主编。李氏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研究,学术成绩斐然,是富有盛誉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可视为学会4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代表。除上述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其他会员,如西人陶然士(T.Torrance)、叶长青、顾富华(R.Cunningham)、约瑟夫·洛克(J.F.Rock)、戴谦和,中国学者郑德坤、闻宥、冯汉骥、林耀华等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也有非常

^① 李绍明:《中国人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中国人人类学评论》,第4辑。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戴维·克罗克特·葛维汉》,载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

重要的贡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西南地区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史志结合、关注边疆”的研究风格，进而开创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独具一格的华西学派^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致力推进“华西边疆之综合研究”，重点关注川西北、西康、川藏及滇北藏、羌、彝、苗等民族地区。研究领域宽广，涉及人文自然科学诸科，成果丰硕，不乏开拓性、价值高的论述。黄思礼(L.C.Walmsley)就指出，尽管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主要研究集中于人类学及考古学等重大题目，但他们也出版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植物种群和动物种族、气候与地貌问题，以及语言和文学、种族与宗教、一夫多妻制与生理学”等问题^②。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工作也同样可以说是富有开创性的。譬如莫尔思对华西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林则(A.W.Lindsay)对中国口腔医学的研究，刘承钊对两栖类动物的研究，胡秀英对冬青的研究，郑德坤对四川考古的研究，方文培对植物学的研究等都可谓贡献空前、意义重大。此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还直接参与了华大博物馆建设。学会对华西地区丰富的物种资源及文化多样性开展的扎实的田野研究使得依托学会成立的自然史与古物两博物馆“皮藏之富，地域之宜，亦无过之者”^③。特别是华大古物博物馆，迅速成为收藏该地区迅速消失的地方文化数据的有价值的陈列馆，并被誉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术呈现出“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学会以英文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来发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其成为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研究中的引领者。在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还处于萌芽之时，学会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所起的先驱及传承作用，几可断言。至于30年代后期西南边疆研究地位陡然上升，各类机构竞相成立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则因其厚积薄发，亦领时代之先声。马长寿在回顾边疆研究十周年(1937年—1947年)时也说，当时从事边疆研究诸学会中，该学会“工作最为努力”，刊印的杂志“最有历史性”^④。

① 李绍明：《中国人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中国人人类学评论》，第4辑。

② 黄思礼著、秦和平译：《华西协合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③ 《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华西协合大学校刊》，1942年第2期，第7页。

④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4期。

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的大型综合性英文学术刊物。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以“华西边疆研究”为目的的刊物，也是近代华西第一份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外文学术刊物。1922年4月创刊于中国四川成都，1924年发行创刊号（第1卷），1947年停刊，共出刊十六卷二十二册（两册专著为增刊）。从1940年始，分为A、B两编，前者为人文科学版，后者为自然科学版（其中1941年的第13卷为AB合编）。

就《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的三百多篇文章来看，杂志综合性极强，明显反映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兼收并蓄”的研究风格，学会并未明确规定会员具体的研究领域，而只作研究地域上的界定，凡举华西的社会、民族、宗教、文化、动物、植物、农业、气象、环境、医学等皆视研究者之兴趣推进。学会提倡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去多视角探究华西社会，结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综合性、多元化”的研究特色，这在杂志上表现极为明显。杂志创刊之初，出版委员会秘书布礼士就曾在《教务杂志》上发布题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介绍文字。布氏鼓吹杂志创刊号内容涉及调查华西地形、地质、人类学、原住民宗教、社会风俗、地图，从“这些文章能获得大量非常有价值的信息”^①。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毫无疑问是较严肃的学术性刊物，但它却并非任何一门学科的专业性杂志。杂志可谓包罗万象，内容涉及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动植物学、医学、农学等多个学科。时至今日，杂志刊载的成果在海内外论著中仍占有很高“引用率”。据笔者对杂志的初步研究，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除去书评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二十余个大的类别。虽然某些文章事实上跨越多个类别，分类并不一定精确，但仅从基本的分类统计上也不难看出杂志“综合”的特色。

虽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内容极为庞杂，但这

^① A.J. Brace,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The China Recorder*, No. 10, (1924): 679.